

毛主席的回忆

1893——1936

烽火出版社

中国新青年共产主义同盟

毛泽东同志在几十年革命的伟大实践，处处可以作我们的榜样，作我们行动的典范。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灵活的巧妙的斗争艺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他如何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永远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每个同志都必须以毛主席为榜样，彻底改造自己。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目 录

前言

编者前言(2021).....1

原代序(1946).....2

毛主席的回忆

第一章 少年时代.....4

第二章 长沙时代15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27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代32

第五章 新政权运动37

第六章 红军之长征44

附页

原翻印本封底(图片)54

原翻印本封底(文字)55

编者后记(2021)58

编者前言

这也只是一个声明。

我只是翻印了由埃德加·斯诺所发表的文字。我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将其手工录入，只为各位同志能够更多了解到毛泽东同志的早年生活。

我对内容中一些词句依照原稿进行了适当的更改：在不改变所表达原意的情况下，对一些旧译本翻译不当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同时将原文繁体录入时更改为简体中文。

近期在网络上，又发现了更多理论知识很好的同志，心中十分喜悦，但一种“理论至上”的思想也更多的出现在了同志们之间。在此，我想警告各位同志，不切实际的空谈，只会将我们的未来引向断崖。“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毛泽东）”，同志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重要使命，停止一切抱怨和幻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走向革命的实践，时刻准备同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

正式印制该书时，已是十二月中旬，临近毛泽东同志的诞辰。在此，我代表个人及焱火出版社全体成员，向伟大导

师毛泽东同志致以最深的敬意！

在录入翻印过程中，可能与原件有误，请谅解。若发现句字差错时，请告知于我即使更正。

——方兴未

2021年12月10日

原 代 序

这只是一个声明。

毛泽东自传，用的是第一人称，和这儿发表的完全一样，可是毛氏原先要求我改用第三人称发表的，如果这样一改，就会失掉了许多正确性和趣味性的价值

美国一家杂志，原要分期连载这个自传，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自传的形式而不是要用传记的形式发表。当时，我无法晤见毛氏，也就无法得到他的许可，然而这稿子，如果为了毛氏个人这一点谦虚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觉得牺牲太大，所以就由我个人负责，保持了原来自传的形式。原来此稿在《亚细亚》杂志上分期连载，曾引起了各方面广大的关注与讨论。

末了，译者尚需向读者略告一二：

本传是由毛氏在陕北窑洞内口述，斯诺依据他所说的用英文记录下来，之后，又把这笔记托吴平先生重述为中文，请毛氏加以修正。因此斯诺很自信这部稿子“并无失真之处”，国内外许多人想知道毛氏个人历史，而不可得。斯诺此书，实在可补文学界、出版界的这一缺点。毛氏对斯诺说过：“只把关于我的生活的一个大略告诉你，你认为怎样？”斯诺回答道：“我正需要你这样。”于是乎，本书在双方同意之中诞生。

——埃德加·斯诺

1946年1月

协商会议揭幕后于陪都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父亲的名字是毛仁生，母亲未出嫁时的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回到了就是我生下来的乡村，做小买卖和一些别的事业，克勤克俭，稍稍积蓄了一笔小小的款子，他便买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那时我家有十五亩地，成了中农。从这几亩田上，我们年年可收六十担谷，每年食用三十五担——以每人七担计——这样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积余，用这一点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一小笔小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田，这样一来，我家就成了“富翁”了。那时，我家每年有八十四担谷的收入。

当我只有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我父亲、母亲、祖父、一个弟弟和我。我们种了七亩地时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个小弟弟，可是我们依旧每年有四十九担谷的积余，这样，我的父亲慢慢地得发起来。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米的买卖，用这种办法，他又赚了一些钱。当他成了富农之后，他又继续这桩买卖，用这种办法，他又赚了一些钱，而且作为主要事业，用去了大部分的时间。至于田地的管理，他则雇了一个长工，此外，再加孩子妻子都到田上劳动。当我六岁

时候，我就开始做田地上的工作。我父亲并不开商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谷米收买下来，转售给城里的商人，如此，他赚到了钱。在冬天磨米正忙的时候，他便添雇一个短工，所以在这个时候，吃饭的人便增加到七个，我们吃得很省，但终是吃得很饱。

当我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本一个小学校里读书，在那里我一直读到十三岁。早上和晚间我在田间工作，白天我读孔子《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个顽固派，粗暴而严厉，常常痛打学生，为了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我不敢回家，因为怕挨打。我莫名其妙地走向县城去，以为县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瞎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兜了几个圈子，走了这许多时候，还没有离开我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以后，出乎我意料之外，情形有点改善了，我父亲的暴厉态度，比以前稍微好一些，而教师也温和多了。我这次反抗行为得到如此结果，使我深受了影响，这是一个胜利的“罢工”啊！

等我学会了几个字之后，我父亲叫我记家里的账，并且叫我学习打算盘。因为我父亲固执着要我学这些事，所以在晚上，我就开始学习这些东西了。他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对于我的懒惰，常常表示怨恨。假如没有账记的时候，他仍叫我到田间去工作，他的性情暴戾，所以常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关于钱这样的东西，他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粗劣的东西。每月十五日，他对于他的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吃鸡蛋和饭吃，可是永远没有肉。对于我则既无肉，

又无蛋。我的母亲是个和善的女人，宽厚而富有感情，永远愿意把家里的所有分给别人。在饥荒的时候，她可怜那些穷人们，常送米给他们。但当我父亲在面前的时候，她就不能那样做了，因为他不赞成做慈善。关于这一件事，我家里常常发生口角。

我们家里分为“两个党”：一党是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我，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有时候甚而雇工们所组成的，是在野的“反对党”，可是在反对派的“联合战线”上意见不能一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她反对任何情感表现，她不赞成对统治力量的公开反叛。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办法。”

但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方法，便是引用经书或是父亲自己的话，作为我自己有力的辩护。我父亲惯用不孝和懒惰两种罪名来责怪我们。我却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父慈才子孝。说我懒惰，则我用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的话来反驳。我说他年纪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应该多做工作。等我到他那样大年纪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年人——我的父亲，继续“积聚财产”，后来大家竟称他为这个小乡村里的小财主。他再用购买的方式来增加土地，却接受了许多别人抵押的田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元，我的不满继续增加。在我们的家庭中，辩证法的斗争是始终不断地发展着。（注：毛氏追述到这些事，老是一边笑着一边用这些幽默的政治术语来做说明。——史诺）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论。我父亲当

众责备我，说我贪吃懒做。这触怒了我，我愤恨他，而且离家出走。我母亲在后面追我，竭力劝我回去。我父亲也劝，可是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子旁边，用自杀来要挟，说若是再进一步，我便跳下去。在这种僵局之下，为了停止“内战”起见，我俩互相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赔罪，做为求饶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磕头。于是，“战争”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停止了。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叛来保卫我的权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宽和些了，反之，当我怯懦屈服的时候，他只是对我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用严厉态度作为教子的政策失败了。我学会了去仇恨他，我们反对派真正成立了一个“联合战线”去对付他。因为这样总是对我有利。如此之后，我的工作也勤快些，我很仔细地记账，他也没有批评责备我的口实了。

我父亲读过了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记账一些事是足以胜任的。我母亲则目不识丁。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农家。所以我成了家庭里的“学者”。我读会了经书，可是我不喜欢经书。我最喜欢中国古时的传记、小说，而关于那些造反的故事，则尤其喜欢。我读过《精忠传》《水浒》《隋唐》《三国志》和《西游记》。那时候，我还年幼，是在我的教师谨慎之下偷读的。我的教师则深恶这些闲书，认为都是坏书。我常常把这些书带到学校里去读，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把他们掩住。我的许多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有许多这样故事，我们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常常地再三讨论。关于这

类故事，我们所知道的比乡村里的老年人还要多。他们也爱听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交换讲述。我相信这些书对于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都是记忆力强盛的年纪里读的。

最后，我在足十三岁时离开了小学，开始整天在田中帮雇工的忙，白天做着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上就替我父亲记账。可是我还继续读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我父亲很懊恼，他希望我能够熟读经史，尤其是当他有一件讼案失败以后。事情如此：他的对手法庭中引用了一句很适当的经典，结果使他官司打败。我常常在半夜里，把我房里的窗户遮掩起来，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就用这种方法，我读了一本《盛世危言》，这书我非常喜欢。这书的作者们都是一些老式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以为中国之所以软弱不振，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介绍这些东西到中国来。而我父亲却认为看这一类的书，是徒然废事旷业。他要我读些经书一样可以、使他在诉讼中得到胜利的东西。

我继续阅读中国的古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些小说中，没有关于种田的农民们的事迹。所叙述的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者文人，从没有见过一个农民英雄。对这件事，是我奇怪了整整有两年。后来，我把这些故事的内容加以分析。我发现了：这些故事都是赞扬著名的武人，很显然是有农民在替他们工作的。

我的父亲在早年和中年时，还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可是

我的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把佛教的教训施予她的孩子们，所以当时我们都因父亲不信佛而感觉难过。在我九岁的时候，我曾和母亲郑重其事地把我父亲不信神的问题加以讨论。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想法，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我们受不住他的攻击，只好让步，另想他法。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与神佛有所往来。

不过，我所阅读的书籍慢慢地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对神佛的不虔诚，而我父亲则毫无表示。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脱难，总是不能忘怀。自那时起，他开始虔信佛教了，并且常常烧香点烛。但是对于我日与剧增的无神论，他仍然置之不问。只是他在困难的时候，就会向神祷告。

《盛世危言》使我产生恢复学业的欲望。我也已经厌倦田地上的工作了。我父亲当然是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经常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位失业了的律师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务文章和其他新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读书的小学校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的。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了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我们。原来那年有一次严重的大饥荒，在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流为饿殍。灾民们举了一

个代表团向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饭吃？城里多得很呢！我从来就没有缺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随即举行了一个民众大会，并且发动了一个游行示威。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户部派了一个姓张的大员，他骑马出来，晓喻人民，说政府正在设法救济他们。显然，这个姓张的话的确是诚恳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责备他和乱党勾结，并将他撤职。接着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事变的领袖。许多人被梟首，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将来“乱党”的一种警告。

这事件，我们在学校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对“乱党”表示同情，但他们都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切身的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他们感觉兴趣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变，而我却觉得这些谋反者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民，所以我对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非常痛恨。

此后不久，韶山的“哥老会”和当地的一个地主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因为他很有势力，所以很容易得到有利于他的判决。“哥老会”败诉了。但是他们不但不屈服，反而反对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座叫浏山的山里，建筑了一个坚固的根据地。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还散播谣言，说哥老会举起反叛之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了一个小孩去祭旗。反叛者的领袖，是一个姓宠的铁匠，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宠铁匠被迫逃跑，后来他终于被捕，杀了头。可在我们学生看来，他确实是一个英雄，因此都同

情这一次叛变。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异常恐慌，穷人们向富农要求帮助。他们开始了一种“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虽然乡里粮食短缺，可是仍然从我们乡里把大批米谷运到城里去。他运出去的一批一批米谷，被穷苦的农民乡民扣留了，于是他忿不可挡。但我对他不表同情，不过对乡民的方法也不满意。

这时我们本地的小学堂里出现了一个“维新派教员”，对我思想上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他是“维新派”，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取消神和上帝，他劝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是一个遭受指摘的人物，但我很敬佩他，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年青的心灵上，留着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我们心灵早已在反叛了。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在我读过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就是这么一句：“呜呼，这国覆云有日矣！”它叙述了日本如何占领高丽、台湾，还有中国在安南缅甸等地方主权的丧失。在我读到这些话时候，我对于祖国的前途，觉得非常担忧。我开始认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

我父亲已经决定把我送到湘潭一家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在起初，我并不反对，认为这或者会是很有趣味的事，可是后来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新学校，我便不顾我父亲的反对，执意要到那里去。这学校是在湘乡县我外婆家所住的地方。我的一个表弟是那里的学生，他告诉我这里新学校和新教育改革的情况。那里不注重经书，而注意西方的新学，教

的方法也是很维新的。

我和表弟一同到那里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误以为这个学校只允许湘乡人进入。后来当我发现这个学校是无限籍贯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贯。在这个学校里，我缴了一千四百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食费及书籍用品费，最后我父亲对于我进这个学校的事同意了，因为许多朋友都认为这个学校可以增加我的赚钱能力。这是我第一次走到离家五十里路远的地方，那时我是十六岁。在这个学校里，我开始读到了自然科学和一些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学校中有一位教员是日本留学生，他带着假辫子，也很容易看出那辫子是假的。人们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许多儿童在一块，他们大多都是地主们的子弟，穿着很值钱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够供给子弟们到这样一个学校里。我穿戴的比别人寒酸，我只有一套较为体面的衣服，学生们不穿大褂，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穿。许多学生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平时穿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可是我也有阔气学生作朋友。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有一个现在已成为作家，住在苏联。

我不受人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校里，是湘乡人是很重要的，而属于湘乡的某乡则更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乡，而上下两乡，因为地域关系，学生们总是不断的争斗，这一乡的人不肯与另一乡的人待在一起。我在这一斗争的局面里严守中立，因为我并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方面的人都瞧不起我，我觉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这个学校里，我进步很快。教员们都喜欢我，特别是那些教古书的教员们，因为我写的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却无心于经书。我正读着我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报，叙述着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一种叫《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我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我崇拜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我的表兄非常感激——那时我以为表兄是很进步的，但是后来他却变成了一个反革命者，土豪劣生阶级的一份子。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他参加了反动营垒。

许多学生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因为他那假辫子。但我很喜欢听他讲述关于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过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几句很美的句子：

“小雀唱，夜莺舞，
春天的原野多么可爱！
石榴红，杨柳青，
仿佛是一幅新的图画。”

（注：这首诗歌显然是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春天庆贺胜利宴会中唱的。——斯诺）在那个时候，我只感觉到日本的美，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的骄傲和武功的发扬。我没有想到竟会有一个野蛮的日本——像我们今日所知道的一样。

这便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所学到的一切。

这时候我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人都死了——虽然新皇帝宣统（现在的溥仪）已经统治了两年。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反君主制度的人，实际上，我还认为皇帝以及官吏们都是很诚实、善良、聪明的人，他们需要康有为维新的帮助。

我那时埋头读古书，对于尧舜、秦皇、汉武等的政绩大为向往。那时候我又读了一些外国历史，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论文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一名词。里面竟然有这样的句子：“在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华盛顿获得了胜利，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本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凯瑟琳女王、彼得大帝、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第二章 长沙时代

我开始想要到长沙去，这是一个大城，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有二十里之遥。听说这个城市是很大的，里面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学校以及巡抚衙门，总之它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建一个专为湘乡人设立的中学。在那一年冬天，我请求我一个高等小学校里的教员介绍我到那里去，他允许了。我步行到长沙，非常的兴奋，又怕也许不准我进城，根本不敢想象我真会变成这个大的学校里学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居然毫无困难的进去了。但在政治急变的形式下，我在那里只住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了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难。这次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富有刺激性的材料，这报是于右任主编的。在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的如此，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我的政治意见，思想是很杂乱的。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并且我也十分明了他们中间的不同。所以我的论文里，我主张应该把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召回来，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了，同时人民对于

立宪的要求普遍的传播着。皇帝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却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学生们越来越趋激进了。他们用反对猪尾巴(辫发)的手段表示他们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把我们的猪尾巴先行剪去，但别的一些起先答应也剪去的人，到后来都迟疑的反悔了。因而我和我的朋友在暗中攻击他们，后来用强迫的手段把他们的辫子剪去，做我们剪辫子的牺牲者有十余人之多。这样子在短短一个时期中，我从谈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一跃而为主张取消一切辫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变人的观点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个在法律课堂的朋友发动了对“猪尾巴”去留的大辩论，双方都有相反而对立的论据。这个法律学生以经书为辩论的根据，坚持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其他反对蓄辫者站在反满的政治立场，提出了一种反对的理论，驳的他们体无完肤。

在黎元洪领导下的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变动得很剧烈。有一天一个革命党，得到了校长的允许，到中学堂里来，作了一次惊人的演讲。在大会上，七八个学生站了起来，对满清加以猛烈的攻击，拥护他的主张，并且号召建立民主国家。人们都全神贯注倾听着，当那个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的一个官吏——在被激动起来的学生前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差不多连呼吸的声音都停止了。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和几个朋友从同学那里集了一些钱，决定到汉口去。听说汉口的街道是很潮湿的，不穿雨鞋就不能走路，我就到一个在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皮鞋。这个军队驻扎在城外，我被

驻防的军队阻拦住了，因为这个地方局势已经很紧张。士兵们已经发给了子弹，他们正向这边冲过来。叛军已经沿着粤汉铁路线前进，长沙城外，发生了一次大战。同时城里面起了一次叛变，城门被中国工人攻占，我得了其中一个工人的援助，得以进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个高地上去观战。直到我看见了“汉旗”在衙门上飘扬——所谓“汉旗”也者，是一块白布中间有一个“汉”字的布旗——我才回到学校里，那时它已经在军队守卫之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府组织了起来，哥老会里两名有名的会员被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以前省咨议局的房屋里。议长是谭延闿。原来的省咨议局被取消了。在革命者所搜查出来的满清文件里，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写成的。徐氏现在已经 60 岁了，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那时候他把他的手指斩断以表示他的诚恳的决心。他的呈文开头是下列两句话：“请求召开国会，余向诸君(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断指告别。”

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他们俩并非坏人，的确颇有些革命意志的。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于是地主和商人对他们表示不满。没有几天之后，当我去访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谭延凯对他们发动了一个有组织的叛变，原来谭氏是湖南地主和军阀的代表。

这时候有许多学生投军，一个学生军已经组成。在这些学生军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因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改变方针，参加正规军队，真正地帮助革命。那

时候清帝还没有退位，所以这个战斗时间相当长久。

我在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七元——可是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在红军里得到的饷银了。我在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七元——可是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在红军里得到的饷银了。这七元钱，我按月用去二元的伙食费，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必须到城外挑水进来，但是我是学生出身不愿意去挑，只好向挑水夫去买水用，我把每月余下来的钱都花在报纸上。我对于读报一件事，简直有些疯狂。鼓吹革命的报纸有《湘江日报》，里面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在这栏中第一次学到了这个名词。我也常和别的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只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我读了一些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我很热心的写信给好几个同级的学生，讨论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可是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写回信给我，并且表示同意。

在我那一队里，我最喜欢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其余的都是鄙俗不堪，甚至于有一个是流氓。我曾劝说过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营长以及士兵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能写，读过不少书，他们对于我的“大学问”都表示尊敬，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党这时还未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在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人们都说，湖南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的战争。当时有许多的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反对袁世凯。湘军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和，预计的战事取消，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以为革命

已经过去了，就决定推出军队，回到书本上去。我只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正有许多学校在开办起来而以报纸广告为媒介，吸引新的学生。我对于学校的好坏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评判，对于进什么学校也毫无主见，可是当我报考以前，我看到一个“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不需要什么学费，供给膳宿并且还稍有津贴。这是很引人注目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广告，他说了许多关于制造肥皂如何与社会有利的话，说它如何能富国利民，于是我便改变了我的报考警察学校的方针，而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那里也交了一块钱的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鼓动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诱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美妙的东西，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关于法律知识的课程，并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求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就在法政学校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命运又由一个商业学校广告形式来阻拦我了。另外一个朋友向我建议，说国家现在是处于经济战之中，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建议打动了，我也在这商业学校里付了一元的报名费，结果我投考而且被录取了。可是同时我还继续看广告，有个广告述说了个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好处，这是由政府主办的，课程很丰富，听

说教员们也都是很能干。我决定了，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之后写信给我的父亲，告诉我的决定。他很高兴，我的父亲向来是赞成经商的。我进了这个学校，只读了一个月。我发现了我对于在这个学校读书有困难存在，因为那里的许多功课的讲稿是英文的，我和许多别的同学不同，英文程度很低，简直只知道字母。这种局面令我感到很是讨厌，便在一个月的末尾退了学，我又继续翻阅广告。

我学业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用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了，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学生很多，毕业生也是很多的。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他十分地帮我，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很喜欢接近这位教员。这位教员借了一本《御批通鉴》给我，这本书中有乾隆皇帝的圣旨和御批。正在这个时候，长沙的官办火药厂爆炸，起了很大的火，可是我们学生都觉得这件事新鲜有趣，好几吨的子弹和炸弹都爆炸了，火药燃烧起来变成一片很强烈的火焰，比爆竹来要好看的多了。一个月以后，谭延闿被袁世凯驱逐，那时袁贼正操纵着民国的政治机构，汤芑铭代替谭延闿，并开始给袁贼准备登基。

我对第一中学不太喜欢。它的课程太少，规则也很繁琐。在我读过《御批通鉴》以后，我认为如果我自己阅读、自己研学也许对我更有益。六个月后，我便离开了学校。自己排了一个学习计划，每天跑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去读书。我对于这件事很规矩，认真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所花出去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上当图书馆一开门的

时候我就进去，在中午的时候，我仅仅休息片刻，去买两个糕饼吃，这就算是我每天的午饭。我每天待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它关门的时候才出来。

在这段自我学习的时期内，我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并且很有兴趣地加以研究。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一本《穆勒名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密莎的《群学肆言》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法意》、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英、美、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我把它们胡乱混在一起学。

那时，我冒充了湘乡县人，住在同乡会馆里，有许多兵也住在那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们毫无事做，而且都很穷。在会馆里，学生和兵士们常常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怨怒爆发，继之用武。兵士攻击，并且想打杀学生们。我躲藏到厕所里，只等大战结束后才出来。

这时候，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肯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我不能再住下去，便开始寻找新的住所。同时，我在认真的思索我的前途，认为我最适合教书。我又开始留心广告，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吸引了我，我兴致勃勃的研究它的好处：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等等。我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去报考，其实是他们需要我帮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论文。我将自己的计划写信告诉家里，并且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我两个朋友写了论文，自己也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实际上，是我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以为我为朋友捉刀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只是一

种友谊。

我在师范学校里做了五年的学生，对于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不再注意。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遇到了不少重要的事情，而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也开始形成了，在这里我把社会实践中的最后经验学会了。

在这个新学校中，有许多的规矩，而我对这些规矩赞成的很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规定为必修课。我希望专修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我特别不敢兴趣，我不愿读它们，所以，在这些课程里，我得到的分数很少。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以为这是极其愚蠢的事。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画的最简便的东西，很快地画完就出课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一个半圆，说是代表李白诗“半壁见海日”一句。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数了，说这是鸡蛋。结果画图这门课程得到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一平均我的别种低级分数都给扯过了。

这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学生们给他起个了绰号，叫“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经是我崇拜的人，我只好改变我的文章风格，就阅读韩愈的文章，学习了旧的古文词藻。所以感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

即使是现在需要的话，我还能写出一篇清通的古文。

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英国留学生杨昌济，他的生活，后来和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的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定的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把一种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志愿灌输给他的学生们。受了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心智的能力》，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的论文很受杨昌济老师的称赞，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评判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经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总是十分有兴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了。有一天我看到了《民报》上登着两个中国学生步行旅行中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打箭炉的事。这件事非常的鼓动着，我想要模仿他们，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我应该先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于是第二年夏天，我开始步行游历湖南省，走遍了五县。有一个和我走在一起的同学叫萧瑜，我们一文不花的走遍了这五县，乡下人供给我们吃饭，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足迹所至，总是受到招待和欢迎。这个和我旅行的萧瑜，后来成为在易培基手下的一位国民党官吏，易氏那时就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高级官员，他替萧瑜谋得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馆里一些最宝贵的宝物，在一九三四年捞款潜逃了，现在他在大连藏身。

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必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旅伴不可，

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于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特别提出能吃苦耐劳，有决心能为祖国牺牲的条件后，我收到三封响应的信。一封是罗章龙的回信，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叛变了，两封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寄来的。但是慢慢的在我的周围聚拢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就是后来新民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国事和命运，有着很大的实力。他们是一小群态度极端认真的人，绝对不讨论身边的琐事，他们所说所做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谈情说爱，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险的，学问的需要是太迫切了，要讨论女人和私人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在十四岁时，我父母替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同居过，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承认她是我的妻子，而在这个时候，我也一点儿也不想念她。关于女人的“媚”的讨论，在那时的青年生活中，通常是占有重要的一页的。可是我的同伴们不仅不讨论这个，即使是生活普通的事情，也拒绝讨论。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家里，这些青年谈起要买些肉，他在我的面前把他的仆人叫来，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情，才叫他买了一小片肉，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喜欢讨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成了热烈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假期里，我们在田里走着，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假如遇见下雨，我们就把衣服脱下，说这叫做“淋浴”。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我们也把衣服脱下，说这是“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

说这是一种叫“风浴”的新游戏。已经下了霜的日子，我们还要露宿，甚而至于十一月里，我们还在冰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这一名词下进行的。

那时候，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朋友们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慢慢我开始觉得需要一个有着更严密的组织。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朋友发起了组织新民学会。这学会有一百八十名人员，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曾经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著名的共产党员有：罗迈——现在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里面；何叔衡——中央苏区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枪杀；萧子璋——作家，现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叶丽雪——中央委员，后来转入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萧铮——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名签名者中之一，不久以前病故。新民学会的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团体组织成功，这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是类似新民学会的一种组织，它的许多会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有恽代英——该社社长，在反革命中被枪杀；林彪——该社社员，现在是红军大学校长。同样的，张灏——现任中央军工作负责人员。在北京也有一个会社，叫做互社，有些会员后来也加入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是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革命者组织了好几个激进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力。（注：这样的团体，天津是觉悟学会，吸引一些激进的青年到这个组织中来，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女士——现在

的周恩来夫人；马钧——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枪杀；孙肇俊——现任国民党官吏。——斯诺)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多少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才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康有为、梁启超来成了我的崇拜人物。梁、康二人，我就抛弃了。

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都有些模糊的感情，但是，我是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我是一九一三年考入师范学校的，一九一八年毕业。

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当中，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元——许多次数的报名费也包括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我要把三分之一耗费在报纸上，因为通常订一份报纸，总是按月一元，此外我还经常在书摊子上买些书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面。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就是在我没有走上井冈山以前，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母亲死了，这样我回家的想法更加淡薄了。我决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时候叫北京——去，湖南有许多学生都计划着要到法国去，用“工读”的方法去读书，法国在欧战中就是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的青年去为它做功。在离开中国以前，这些学生预备先在北平学习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出洋的学生中间，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了这一运动的影响，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员职位，跑到法国去，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加入了共产党。

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而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本人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国家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假如

我把时间花在中国，那对祖国是更为有利，那些决意要到法国去的学生，从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的校长——教授法文，可是我没有，我个人另有计划。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 K 党”。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

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

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 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实行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次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一九二〇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

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代

一九二〇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立……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全部学生实际上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

赵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工人领袖(一个叫黄爱,一个叫庞人铨),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即黄爱)。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会已经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湖南全省总工会]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鲁莽而无用的举动。

我被派到上海来帮助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年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统一战线以反对北洋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

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败了两个著名的军阀，全城和国民党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训练班来训练他们。听讲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一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

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

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必定较现在大为强盛。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

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桩事件，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是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第五章 新政权运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长久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省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军；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政权；组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队叫做“第一农工军第一师”，是经过省委员会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省委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

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争，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後，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

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冈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据)时，军队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上，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冈山备受党中央“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时，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

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要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这种策略与党中央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扩展的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冈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信仰这个政策，因此，党决议提出，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

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强调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个山）。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闽西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

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第六章 红军之长征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1928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1. 离开一家人家时，把门板(睡觉用)放回原处；
2. 把你们睡觉时用的草席，卷好交还；
3. 对老百姓要温和客气，随时帮助他们；
4. 一切借用的物品都要归还；
5. 一切损坏了的东西都要赔偿；
6. 和农民交易要规矩；
7. 买东西要付钱；
8. 要讲卫生，厕所要设在离人家很远的地方。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

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

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

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

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南京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〇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国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苏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两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冲破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国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

仍就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击溃。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的胜利结果这次战争。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

三[一]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这个战术的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内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占领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

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战略有着决定的作用，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

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

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请求各党各派，各种职业的人们和我们联合起来，为建设新中国和建立彻底的中国民主政府，这是必要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的，也正和党、军队的工作和目的的一样，此后要全力以赴以期达到这个目标。

注意：

我們翻印了毛主席的回憶，在抄翻印中也許與原件有誤，發現句字差錯時，望及時更正。

北京政法学院《红旗》红卫兵、牛街公社生产部翻印

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翻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九场九〇三革命造反队翻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新青年共产主义同盟翻印

云南烽火出版社翻印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加页部分

誓死保卫毛主席

前言

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展览馆，见到毛主席家里六位烈士的遗像，并知道了他们的简单生平。毛主席的亲戚是革命的忠贞，毛主席的一亲，为了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为了让我们革命接班人永远不忘革命前辈流血牺牲，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火红旗，永远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永世千革命，永葆革命江山不变颜色，特地把六位烈士的简单生平用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解词一起写在下面，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好好想一想，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呵！

六位烈士的简单生平

- 毛泽民烈士：(1896—1943) 毛主席的大弟弟。1922年入党，1942年于新疆被杀，1943年英勇就义，牺牲时仅47岁。
- 毛泽覃烈士：(1905—1935) 毛主席的小弟弟，1925年参加革命，1924年入党，长征途中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地带和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当时已历任五年红军独立师师长，牺牲时不满30岁。
- 杨开慧烈士：(1901—1930) 毛主席的爱人，1921年入党，是我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5年和毛主席一起回家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主席带着队伍上井冈山，杨开慧同志留在长沙，坚持武装斗争，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特务林彪杀害，她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概，1930年4月在长沙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 毛泽建烈士：(1905—1929) 毛主席的堂妹，与毛主席一块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1927年毛主席率领队伍上井冈山，她带领游击队上山，坚持武装斗争，1929年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捕，受尽重刑，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24岁。
- 毛岸英烈士：(1922—1950) 毛主席的大儿子，1946年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央军委副官，1950年主席把他送到朝鲜前线，1950年11月在美机轰炸下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
- 毛楚雄烈士：(1927—1946) 毛主席的侄子(毛泽覃同志的独子)，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去延安途中被敌人抓住活埋，牺牲时年仅19岁。

讲解员这时激动地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革命奋斗，从16岁开始，已经50年了，在哪个革命时期没有毛主席的亲人为了革命英勇牺牲呢？

在十年内战时期有毛主席的亲人毛泽民、毛泽建、杨开慧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毛主席的亲人毛泽覃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有毛主席的亲人毛楚雄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在朝鲜战场上有毛主席的亲人毛岸英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为了革命，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有什么没有贡献出来呢？不但写下了雄文四卷，并且献出了六位亲人，可是现在竟有人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没有无产阶级天下。(口号略)

清华大学化六〇四班《新兵》翻印
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九场九〇三革命造反派翻印

1966.10.21

1966.12.26

誓死保卫毛主席

前言

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展览馆，见到毛主席家里六位烈士的遗像，并知道了他们的简单生平。毛主席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毛主席的一家，为了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为了让我们革命接班人永远不忘革命前辈流血牺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永远干革命，永保革命江山不变颜色，特此把六位烈士的简单生平连同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解词一起写在下面，望大家看完以后好好想一想，这是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啊！

六位烈士的简单生平

毛泽民烈士：（1896——1943）毛主席的大弟弟，1922年入党，1942年于新疆被捕，1943年英勇就义，牺牲时仅47岁。

毛泽覃烈士：（1905——1935）毛主席的小弟弟，1923年参加革命，1924年入党，长征途中在江西省和福建交界地带和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当时已历任半年红军独立师师长，牺牲时不满30岁。

杨开慧烈士：（1901——1930）毛主席的爱人，1921年入党，是我党第

停止一切抱怨和幻想 用行动建设社会主义

一批党员之一,1925年和毛主席一起回家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主席带着队伍上岗山,杨开慧同志留在长沙坚持武装斗争,1930年在长沙被白匪何键逮捕,施加重刑,她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概,1930年4月在长沙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毛泽建烈士:(1905——1929)毛主席的堂妹,与毛主席一块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1927年毛主席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她带领游击队上山,坚持武装斗争。1929年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捕,受尽重刑,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24岁。

毛岸英烈士:(1922——1950)毛主席的大儿子,1946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担任中央翻译工作,1950年毛主席把他送到朝鲜前线,1950年11月在美机轰炸下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

毛楚雄烈士:(1927——1946)毛主席的侄子(毛泽覃同志的独子),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在去延安途中被敌人抓住活埋,牺牲时年仅19岁。

讲解员这时激动的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革命奋斗,从16岁开始,已经56年了,在哪个革命时期没有毛主席的亲人为革命牺牲呢?

停止一切抱怨和幻想 用行动建设社会主义

在十年内战期间有毛主席的亲人：毛泽覃、毛泽建、杨开慧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毛主席的亲人毛泽民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有毛主席的亲人毛楚雄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在朝鲜战场上有毛主席的亲人毛岸英烈士为革命牺牲了。

为了革命，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有什么没有贡献出来呢？不但写下了雄文四卷，并且献出了六位亲人，可是现在竟有人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没有无产阶级天下。（口号略）

清华大学化六〇四班《新兵》翻印

1966.10.21

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九场九〇三革命造反队翻印 1966.12.26

编者后记

今天是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 128 周年。我想，努力地去学习和工作就是最好的纪念。

我将 1937 年译本的内容与现代译本的内容逐一对比，发现其内容相差太大，且现代译本许多词句与原稿之意不符，还缺少一种毛氏自传的味道，故本书翻印时依然选用 1937 年译本作为参考录入。当然，各位有空也可以买本现代的《毛泽东自传》来与本书对比着看。

最近心情很复杂，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其他的地方，都有了同志出事的消息。快新年了，望大家都小心。但我们从未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太阳照常升起，还会在遥远的一天，永不落下，而我们就是新一代的追光者。

不会写后记。不是很重要吧？

——方兴未

2021 年 12 月 26 日

深夜于云南家中

毛主席的回忆(1893——1936)

烬火出版社出版 指定地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 印张 · 字数

2021年12月昆明第1版 · 2021年12月洛阳第1次印刷

临时书号 10001 · 001 定价 3.68 元

临时书号：10001 · 001

定 价： 3.68 元